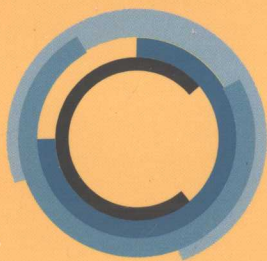


◀ 新闻传播学术原创系列 ▶

20世纪90年代 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

廖圣清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复旦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九江学院图书馆



15677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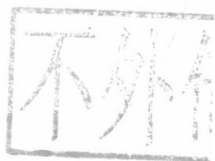
1624361

新闻传播学术原创系列

20世纪90年代 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

廖圣清 著

G206.3/18962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廖圣清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10
(新闻传播学术原创系列)
ISBN 978-7-309-09300-1

I. 2… II. 廖… III. 大众传播-传播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G2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5225 号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

廖圣清 著

责任编辑/章永宏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67 千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300-1/G · 1133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 1990 年代那些平凡而又难忘的故事

祝建华

日前,圣清博士来信,嘱我为本书写序,我欣然答应。以前也曾有数位朋友找我作序,我都谢绝了,因为我对那些领域知之甚少,同时我还认为学术著作一般不需他人代序。这次破例,皆因为我比较熟悉本书的写作过程、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读书稿时不断引发感悟,愿意借此与读者分享。

本书以圣清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正开始写博士论文。当时内地各大学订阅的 SSCI 期刊不多,我协助他收集了部分期刊论文,也给了一些建议。以后,我还请他来我们香港城市大学短期访问,以便更充分利用这里的资料。算起来,我在城大先后请过十位来访学者,圣清恰好是最早的一位。近几年来,我在城大设立了互联网挖掘实验室,邀请他和其他几位担任兼职研究员。我觉得,本书的写作过程,折射了内地新生代传播学者走向规范化、实证化、国际化的历程。

本书以 1990 年代西方传播学研究为研究对象。在有些读者看来,90 年代也许没有特别之处。此话不错。如果套用产品生命周期的术语来说,20 世纪 50—60 年代是传播学的导入期(Introduction),70—80 年代是其增长期(Growth),而 90 年代之后则是其成熟期(Maturity)。传播学的主要理论,如议程设置、涵化分析、沉默螺旋、第三者效果、预示效果、框架理论等,一一诞生于增长期。进入 90 年代以后,就如成年人一样,传播学少了惊喜,多了稳定(是否等于保守?)和多元(是否等于琐碎?)。然而,这并非意味这段历史不值得回顾。相反,平实见真知,魔鬼在细节,于无声中听惊雷。本书中充

满了这些平凡的细节,尤其值得伴着互联网长大的传播学新人阅读,看看在互联网改变世界之前夜的传播学界关心什么,其中哪些延续至今,哪些默然消逝。朋友,听到什么惊雷了吗?

我自己的经历也如此。我正好是 1990 年夏天博士毕业,开始在美国任教,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开始,当时我做研究,有两种选择:一是研究媒体与战争,二是优化成熟理论。前者可谓“创新型”研究,因为那是首次由电视直播的战争(而 20 世纪 60 年代越南战争的电视报道只是事后回放)。不少学者选择做创新者,以期能像越战研究那样给传播学带来新突破。我没有如此雄心,选择优化已有 20 年历史的议程设置理论。现在回头看,两次海湾战争先后过去了,但好像没有留下什么学术精品;而安于守业者,却各有意外的创新。我在 1990—1995 年写的“零和游戏”(Zhu, 1992)、数学模型(Zhu et al., 1993)和负荷能力(McCombs & Zhu, 1995)等三篇论文,分别被 *Journal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和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以头条论文发表。而在 90 年代的后 5 年,我到了香港,开始转做新媒体研究,更体会到创新之难。读了 Roger Fidler (1997) *Mediamorphosis* 之后,才明白创新往往由守旧转化而来。刻意创新新不来,无心破旧旧自去。世事往往就是如此诡异。

回到本书的研究方法。本书属于学科发展史研究。以我之见,这类研究主要有四种方法:一是记流水账(chronicle accounts),叙述某人某时说了什么,常出现在博士生论文的文献回顾;二是个案法(case studies),选择若干人物或理论,讲演变故事(如 Lowery & De Fluer, 1995; Rogers, 1994);三是定性归纳(qualitative synthesis),相当于在流水账的基础上,抽象出若干类别、趋势等(如每年一期的 *Communication Yearbook* 中的文章);四是文献内容分析(bibliographic content analysis),用内容分析方法,对学术著作(一般是期刊论文)进行标准化的分类和统计。各种方法,各有利弊。本书以内容分析为主,辅以定性归纳,其结果既见树也见林。

我比较喜欢文献内容分析,因为其发现的类别、趋势等,更客观、全面和精确。如前几年发表的两篇此类论文,一篇总结了大众传播学的理论流派(Bryant & Miron, 2004),一篇回顾了大众传播学的研

究方法(Trumbo, 2004), 是我教学时的必用补充读物。这里有个挺传神的小插曲: 有次在内地某校做讲座, 有同学问: “基于现在国际传播学主流已经转移到定性研究……”我打断她, 好奇地问: “你的‘基于’来自何处?”她说: “我们在书店里看到的翻译著作大多如此。”我即从手提电脑中找出我根据数据画的图, 检验大家根据主流期刊内容分析结果来把握国际学术界的趋势。两年前, 我们研究组对 2000 年以后社会科学中的互联网研究进行回顾, 此时已经有过若干个类似报告(包括两本工具书)。但我们觉得, 互联网研究数量浩瀚, 散落在社会科学各领域, 只有采取自下而上、不设任何边界和分类标准, 才能避免已有回顾中的“盲人摸象”倾向。所以, 我们采用了比内容分析更接近文献原状态的文本挖掘方法, 真有不少预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发现, 其结果会在即将出版的 *New Media & Society* 互联网回顾专辑中以头条论文发表(Peng et al., in press)。广告插播到此结束, 请大家细心品鉴本书正文。

参考文献

Bryant, J., & Miron, D. (2004), “Theory and Research in Mass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4, 662-704.

Fidler, R. (1997), *Mediamorphosis: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Pine Forge Press.

Lowery, S. A. & DeFleur, M. L. (1995), *Mileston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dia Effects*, 3rd edition, Longman.

McCombs, M. E., & Zhu, J. H. (1995), “Capacity, Diversity and Volatility of the Public Agenda: Trends from 1954 to 1994,”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9 (4), 495-525.

Peng, T. Q., Zhang, L., Zhong, Z. J., & Zhu, J. J. H. (in press), “Mapping the Landscape of Internet Studies: Text Mining of Social Science Journal Articles, 2000-2009,” *New Media & Society*.

Rogers, E. M. (1994),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Free Press.

Trumbo, C. W. (2004), “Research Methods in Mass Communica-

tion Research: A Census of Eight Journal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1, 417-436.

Zhu, J. H. (1992), "Issue Competition and Attention Distraction: A Zero-sum Theory of Agenda-setting," *Journalism Quarterly*, 69 (4), 825-836.

Zhu, J. H., Watt, J. H., Snyder, L. B., Yan, J., & Jiang, Y. S. (1993), "Public Issue Priority Formation: Media Agenda-setting and Soci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1), 8-29.

目 录

序言	祝建华
第一章 绪论	1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1
二、研究综述	4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11
第二章 (大众)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1900—1990 年)	16
一、(大众)传播学的发展历程	16
二、(大众)传播学研究的现状	26
第三章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综述	36
一、研究问题	36
二、研究方法	41
三、研究结果	46
四、讨论	61
第四章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传者分析 研究	64
一、传者分析的发展历程	64
二、20 世纪 90 年代传者分析的量化分析	75
三、讨论	86
第五章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渠道分析 研究	89
一、渠道分析的发展历程	89
二、20 世纪 90 年代渠道分析的量化分析	94

三、讨论	104
第六章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内容分析研究	106
一、内容分析的发展历程	106
二、20 世纪 90 年代内容分析的量化分析	111
三、讨论	120
第七章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受众分析研究	122
一、受众分析的发展历程	122
二、20 世纪 90 年代受众分析的量化分析	127
三、讨论	138
第八章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效果分析研究	141
一、效果分析的发展历程	141
二、20 世纪 90 年代效果分析的量化分析	145
三、讨论	156
结语	160
参考文献	168

第一章 绪 论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一) 研究问题

本书主要采用文献分析与内容分析两种研究方法,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考察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力求较为系统、深入地描述其研究状况,揭示其发展趋势。

(二) 研究意义

1. 推进中国传播学发展的现实需要

自 1978 年正式引进以来,传播学在中国大陆获得长足进步,并产生广泛影响(廖圣清,1998;2003)。1996 年,新闻学由二级学科上升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传播学成为与新闻学并列的二级学科,由此获得了安身立命的根基,从而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1998 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设立传播学博士点。2000 年,教育部在复旦大学设立了国家级传播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2001 年传播学上升为一级学科。

传播学的引进和发展,对新闻传播的理论研究和教育以及传媒实践,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吴廷俊,2002;明安香,1998;李良荣、李晓林,1998)。现在,中国传播学正面临发展的大好良机,“新闻传播学在中国的境遇,已经与主要发达国家‘接轨’,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也是当前中国高等院校系统中所能争取到的最高学科地位。”(张国良,2003)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传播学健康、快速地发展,成为一个极

具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重要课题。

但是,对国外传播学的新情况、新发展了解不够,这将影响中国传播学的继续发展。实际上,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问题,一直为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者密切关注,并时而引发热烈探讨。在已召开的数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就传播学的发展问题,许多学者各抒己见、热烈讨论(廖圣清,2002a)。2001 年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召开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规划中国传播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方向”(廖圣清,2002b)。然而,这些热烈的讨论话题却相对集中,始终聚焦在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上。虽然,对于是否需要“本土化”、如何实现“本土化”等问题,研究者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是越发激起了研究者强烈的创新意识,他们都希望在国际传播学研究中,中国能够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研究者因此能够更加科学、客观地看待中国传播学研究与国际传播学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愈是感觉到对国外传播学研究了解不足,特别是对其最新的发展情况了解不够。有学者十多年前感慨,介绍 1990 年代的传播学新理论,掌握最新情况,“这方面几乎还没有人在做,九十年代人家都在谈新问题,而我们还在嚼人家七八十年代的东西不也太落后了吗?如果这些工作都没做,在远远低于人家学术水平的情况下,怎么能谈跟上人家的步伐。怎么能够搞出比人家高的东西呢?”(袁军等,1999)

因此,本书选取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的最新发展情况,试图概括最近二十年西方大众传播学的研究状况,以求从整体上把握西方大众传播学的发展趋势,为中国传播学研究提供参考资料,从而推进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

2. 追踪国际传播学界的前沿课题、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需要

半个多世纪以来,传播学从诞生地美国逐渐向世界各地传播开来。作为一门深深植根于人类传播现象中的交叉学科,传播学天然具有跨学科的特征并日趋凸显。当今国际传播学界的研究兴趣和学术视野,几乎延伸到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张国良,1998)。

自 1950 年代以来,西方传播学者对该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清理

(石义彬、单波,2000a),但是,诚如美国学者 J. W. Delia 所言,西方传播学从未依赖单一的知识来源,也从未统一过(J. G. Delia,1987)。还有学者明确指出“传播科学尚处于‘前范式阶段’”(Craig,1989)。

当前,在学科领域不断扩展,特别是研究对象越来越庞杂、细分化的同时,国际传播学界越来越注意从总体上梳理、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两种取向:

(1) 以世纪之交为契机,回顾、总结、反思 20 世纪的传播学研究状况(张国良,2000)。例如,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 1997 年秋季号,以“媒介历史”为专题,从各种角度描述了媒介百年发展史;日本《大众传播研究》半年刊连续在 1997 年(总 50 期)、1998 年(总 53 期)推出以“现代大众传播理论的关键词”、“现代大众传播理论的展开”为主题的专辑,较为全面地回顾了传播学的历史变迁。

(2) 传播学中的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两大学派,分歧或者说区别依然存在,但彼此不能相容的排斥倾向已经明显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相互取长补短的意愿(李彬,1997)。在经验学派的大本营——美国,批判学派的声音也日趋响亮。伯利等学者出版的《最终的权力:重议〈传媒的四种理论〉》,对《传媒的四种理论》展开批评,呼吁摆脱冷战思维、两极思维的束缚,成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实例(郭镇之,1997)。1997 年,劳特里奇出版公司(Routledge)在伦敦和纽约两地推出的《国际媒介研究:批判性考察》(*International Media Research: A Critical Survey*)一书,这是英国学者约翰·科纳(John Corner)、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和苏格兰学者菲力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邀请欧美著名传播学学者对媒介研究的进展作出的权威性评述。讨论的主题集中在三个方面:北美和欧洲媒介研究状况比较,国家、市场和传播体制,媒介研究与媒介政策。这次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空前的。欧美两地传播学界的反思、接近和整合,日益促进了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融合(石义彬、单波,2000b)。

上述两种取向的研究是富有探索意义,迄今尚未完结,许多努力尚属初步尝试。因此,本书也希望准确把握国际传播学界的最新动向,紧密追踪国际传播学界的这一研究前沿,并努力在中国传播学界

与国际传播学界之间,搭建一个基础性的学术交流平台,最终推进中国传播学的新发展。

二、研究综述

(一) 国内研究

1. 关于传播学新理论、新发展的译著情况

如前所述,传播学如何在中国大陆发展的问题,一直为中国大陆传播学者所关注。这当中自然包括对传播学在其诞生地、大本营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发展情况的了解。传播学是“舶来品”,西方传播学著作的译介工作,对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至为重要。虽然传播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仍是争论未明的问题,但是,要能为我所用,必先对其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和把握。

然而,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大陆的传播学译著的出版工作显得极为薄弱。

由表 1-1 可知,从 1981 到 2000 年 20 年间,中国大陆翻译出版的传播学著作总共不足 60(59)本,平均每年不到 3 本。我们可以进一步合并归纳将其分为三个阶段:①1981—1989 年,出版了 13 本;②1990—1998 年,出版了 19 本;③1999—2000 年,出版了 27 本。具体地来看,1989 年出版了 6 本,出现了一次高峰,但是,随后出版的数目下滑,1993、1995、1996 三年竟然未出版一本译著,直到 1999 年出版了 7 本,时隔 10 年才再次出现新的高峰,并随后呈上扬态势。这似乎说明传播学的翻译介绍工作 2000 年开始才有所加强。

表 1-1 1981—2000 年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译著数目

年份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译著数目	1	0	1	1	2	0	0	2	6	3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译著数目	4	4	0	2	0	0	2	4	7	20

(本表根据邵培仁辑录的《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制作)

从1980年代出版的传播学译著来看,虽然数量有限,但是毕竟处于刚刚接触传播学的早期阶段,当时研究者更多的是需要对传播学有些概貌性的认识,以求从整体上把握传播学。由此观之,那时中国大陆对传播学新情况的把握还可算作比较及时的。1985年以前虽然只翻译出版了五本著作,但其中三本著作,即施拉姆、波特合著的《传播学概论》、施拉姆(译为宣伟伯)撰写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以及赛弗林、坦卡德合著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都是美国当时有代表性的传播学教材。读者从中能够较为系统地了解(大众)传播学的主要内容。这三本著作对于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知识普及作用。1980年代末期(1989年)出版的几本译著都具有类似的较高的理论参考价值。麦奎尔、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以模式的形式简明而深入地介绍了大众传播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情况,是一本具有学术史特征的重要理论读物。德弗勒、丹尼斯合著的《大众传播通论》是又一本较有代表性的大众传播学教程。阿特休尔撰写的《权力的媒介: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则是传播学中兴起的批判学派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另外,竹内郁郎撰写的《大众传播社会学》、巴特勒撰写的《媒介社会学》,则提供了大众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试图揭示媒介与人类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

与1980年代相比,1990年代传播学译著的出版,无论在数量上还是选题上,似乎都没有太多突破。数量上,1990—1999年,共出版了26本,是1980年代的两倍。但是,1990年代的出版主要集中在后期的1998、1999年;1990—1997年出版了15本,与1981—1989年出版的13本相近;只是1998、1999年分别出版了4本和7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选题上是否有重要变化,1990年代出版的多数译著的主题为新媒介技术,还有少数的人际传播、文化传播等方面的译著;关于(大众)传播理论的主要著作则仅有三本:1990年出版的德弗勒、鲍尔-洛基奇合著的《大众传播学诸论》,1991年出版的切特罗姆撰写的《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以及1999年出版的小约翰撰写的《传播理论》。《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美国人的传播思想,但研究时间截止到1960年代。《大众传播学诸

论》和《传播理论》，是两本较有代表性的（大众）传播学教材，但对 1990 年代最新的研究成果整理不够。

本世纪之初，中国大陆传播学理论研究形成又一次高潮。西方传播学理论的翻译介绍工作也在积极展开，传播学译著的出版变得红火起来（刘鹏，2002）。继华夏出版社推出《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后，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世界传播学经典教材》，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翻译版》。继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新华出版社推出《西方传播学经典文库》，华夏出版社推出了《传播·文化·社会》译丛，商务印书馆推出《文化与传播译丛》。

尼克·史蒂文森的《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一书，“比较全面地对 20 世纪中叶以来本领域内的各相关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关于媒介文化的理论及核心观念，进行了细致精深的梳理和表述，并对各学派内的研究视点进行了分析整理，提出了别树一帜的观点，而且不乏深中肯綮之见，这对我们知晓西方的媒介文化理论研究是极有裨益的。”（王文斌，2001）但是，本书是根据塞奇出版公司（Sage）1995 年版译出的，它最多反映了 1990 年代初期的某些研究状况。而且，正如作者本人在中译本序言中所强调的“在此表述的诸种思想传统，大多吸取于（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等）若干不同社会的交互作用，而且混合地表征了各种学术交流的情况。”（史蒂文森，2001）因此，该书主要地介绍了欧洲各国的研究情况，“这对于全面研究媒介文化理论显然是有其局限性的”（王文斌，2001）。它也不可能对以欧洲与美国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的研究进行比较，从而揭示出传播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2002 年 3 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由殷晓蓉翻译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作者罗杰斯通过几年的档案研究，以及对人类传播学先驱者的采访，追述了构成人类传播学的整整一个世纪的事件，表明：传播研究富有意义地影响了社会学、政治学 and 心理学等学科，这是对多年来的传播学研究的一种突出的、有重点的综合（罗杰斯，2005）。该书从传播学的欧洲起源——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谈起，但结束于 20 世纪 60 年代传播学作为美国大学

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

2008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孙五三翻译的《传播学简史》。作者阿芒·马特拉和米歇尔·马特拉,针对传播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合法性长期不断地受到质疑的尴尬地位,试图厘清该领域内的各个派别及其差异,简略地描述了这些学派、潮流和趋势的发展(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2008)。

2008年12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蕴敏翻译的《传播思想》。作者贝内纳·米耶热在这本概要性的小书中,以奠基性思潮、研究问题的拓展和当前的争议三个部分,以一种概括的方式来呈现传播思想的轮廓及其突出方面,仅仅是概述了甚至是简单地提及了一些传播思想(贝内纳·米耶热,2008)。

2008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何道宽翻译的《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作者汉诺·哈特对美国的批判性传播研究作了较为系统的表述(汉诺·哈特,2008)。

2009年7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芳翻译的《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作者埃里克·麦格雷按时间顺序、分主题介绍了传播学理论史上出现过的主要思潮,可以用作传播学理论的入门读物(埃里克·麦格雷,2009)。

这些传播学论著译介的特点是,题材涉及领域比较广泛,并力求以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为主。但是,这项工作毕竟刚刚开始,在选题方面仍有待改进,如选取教材较多、经典论著较少;况且翻译出版论著的数量还是有限的。这样,就难以在短时间里展示出传播学研究新进展的整体情况。而且,对传播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最新的发展情况,进行归纳分析的译著还没有出现。

对国外传播学论著的译介工作的不足,必然制约传播学者对国外最新研究情况的了解和把握。

2. 关于传播学新理论、新发展的论著情况

论文方面,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新闻学》,本书检索了关于传播学新理论、新发展情况的论文。结果发现,此类论文数量有限。但是,从中还是能看到研究者对传播学新理论、新发展的关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

(1) 通过参与国际传播学研究组织的研讨会,考察传播学的最新发展情况。例如,1996 年张咏华发表的《挑战、机遇、希望:国外传播学界新动态一瞥》,作者从国际传播学会 1995 年会看到国外传播学界的传播新技术研究热。还有 1997 年张国良发表的《新媒介研究的主流化和实证化:从日本大众传播学会'96 秋季研讨会看当前研究动向》、1999 年黄旦的《领域、关系、学科——全美传播学会(NCA)第 84 次年会印象和启事》、1999 年陆晔、潇湘发表的《传播学的多元视角与多维框架——'99 年国际传播学会第 49 届年会述评》等。

(2) 对新理论的介绍和应运。这主要介绍了三种传统学派的新理论:媒介依赖理论、第三者效果理论、框架理论。如,张咏华的《一种独辟蹊径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媒介系统依赖论评述》,陶鹤山撰写的《第三人效应理论:传播理论研究的新视角》,黄敏、张克旭的《关注台海——网络媒体关于 5·20 事件前后报道的对比分析》等。同时,对批判学派的研究成果的介绍增多。如张颐武的《文化研究与大众传播》,金元浦的《文化研究的视野:大众传播与接受》等。

(3) 对传播理论新发展的探究。如郭中实的《涵化理论:电视世界真的影响深远吗?》,殷晓蓉的《当代美国发展传播学的一些理论动向》,黄翊、李俊的《“议题融合论”:传播理论的一个新假设》等。

(4) 对传播学研究的综合分析。这类研究多为分析某个理论或某个研究领域,鲜有从宏观上透视传播学整体研究。如王怡红的《认识西方“媒介权力”研究的历史与方法》,单波、李楠的《大众传播与文化:丹尼斯麦奎尔的“传播——文化”观评述》等。从宏观上分析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有:陈卫星的《西方当代传播学术思想的回顾与展望》、石义彬、单波的《比较与整合:西方媒介理论的新动向》和《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表述活动的历史与逻辑》。《西方当代传播学术思想的回顾与展望》回顾了传播学的三个基础流派以及 1960 年代以来的五个新学派,并探讨了传播学究竟应该研究传播什么?《比较与整合:西方媒介理论的新动向》评析了前述《国际媒介研究:批判性考察》一书以及欧美学者在这次合作研究中所进行的学术对话。《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表述活动的历史与逻辑》回顾并反思了 20 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发展历史,认为从理论表述的“场域性”来看,它